

民族学和社会学 中国化的探索

抗战时期专家对
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

聂蒲生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族学和社会学 中国化的探索

抗战时期专家对

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

聂蒲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抗战时期专家对西南地区的
调查研究/聂蒲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61-0214-5

I. ①民… II. ①聂… III. ①民族学—思想史—中国—现代
②社会学—思想史—中国—现代 IV. ①C95-092②C9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3823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297 千字

定 价 3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引言.....	(1)
第二节 本课题学术研究现状.....	(4)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8)
第四节 本著的写作思路和主要方法	(11)
第一章 总貌	(17)
第一节 以实地调查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在 中国的发展史	(17)
一 民族学田野调查在中国的发展	(17)
二 社会学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发展	(23)
第二节 对西南地区开展实地调查的必要性和 组织实地调查的重要机构	(28)
一 对西南地区开展实地调查的必要性	(28)
二 组织实地调查的重要机构	(29)
第二章 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	(35)
第一节 抗战时期在昆民族学家对云南各民族的 田野调查研究	(35)

2 / 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探索：抗战时期专家对西南地区的调查研究

一	徒步穿越湘黔滇：中国传说学术(特别是 人文科学)转向现代学术	(36)
二	对云南各民族的田野调查研究概况及其 取得的辉煌成就	(39)
三	吴泽霖教授在云南开展的民族田野调查研究	(44)
四	袁家骅教授对云南路南县的民族 田野调查概况	(57)
五	开展对云南各民族田野调查研究的 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59)
第二节 抗战时期在昆语言学家对云南 各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65)
一	云南民族语言研究的传统	(65)
二	对云南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及成果	(67)
三	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及成果	(70)
四	邢公畹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调查 及其成就	(74)
五	对民族学研究的贡献	(76)
第三节 抗战时期吴泽霖教授对贵州少数民族 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		(82)
一	对贵州仲家生活——食俗的调查研究	(83)
二	对贵阳苗族跳花场的调查研究	(86)
三	对海梗苗中的斗牛的调查研究	(89)
第四节 抗战时期四川的民族学研究		(90)
一	历史沿革	(90)
二	抗战时期四川的民族学研究	(91)
三	抗战时期四川的民族学研究主要成果	(93)

第三章 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	(97)
第一节 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	
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的人口普查研究	(97)
一 对本土人口资源的认识	(98)
二 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重要开端	(100)
三 从普查结果推导当时中国人口概况	(107)
四 陈达领导的人口普查研究的重要意义	(123)
第二节 费孝通对抗战时期禄村农田的调查研究	(132)
一 费孝通与“魁阁”研究室	(132)
二 对禄村农田的研究	(134)
三 禄村调查研究中的方法和经验	(139)
四 费孝通的云南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142)
第三节 张之毅对抗战时期玉村农业和商业的	
调查研究	(146)
一 玉村农业耕作和蔬菜种植	(146)
二 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	(152)
三 织布和养鸭	(157)
四 家庭消费和积累	(159)
五 农村人口的外流	(161)
六 传统社会中财富的猎取	(165)
七 商业资本的活动	(166)
八 资金利用与土地权的集中	(169)
九 费孝通对四种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	(171)
第四节 陈达和史国衡对抗战时期昆明工业和	
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	(173)
一 陈达对抗战时期昆明工业和劳工问题的	
调查研究	(173)

二 史国衡对抗战时期昆明一国营工厂劳工问题的调查研究	(176)
第五节 抗战时期四川的社会学研究和人口学研究	(182)
一 抗战时期四川的社会学研究	(182)
二 抗战时期四川的人口学研究	(191)
第四章 综合调查研究	(196)
第一节 曾昭抡率领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	
步行考察大凉山	(196)
一 考察准备	(197)
二 考察地点介绍和简要考察经过	(201)
三 考察内容	(204)
四 考察过程中体现的严谨治学精神	(208)
第二节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云南石佛铁路沿线的调查研究	(210)
一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及其刊物《边疆人文》	(210)
二 陶云逵教授领导的对石佛铁路沿线的综合调查研究	(214)
三 陶云逵教授学术研究之综合评价	(217)
第五章 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 20 世纪上半叶民族学的中国化	(231)
第一节 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专家调查研究成果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231)
一 民族学家对西南各民族的田野调查研究——民族学中国化的积极探索	(231)

二 社会学家对西南的社区研究——社会学 中国化的积极探索	(241)
第二节 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专家调查研究 工作的社会意义	(258)
一 江应樑、吴泽霖等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研究 推动了西南边疆建设	(258)
二 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严谨 治学的学风	(260)
三 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开展实地调查研究的骨干， 有如群星灿烂	(262)
四 调查研究工作的美中不足之处	(267)
第三节 20世纪上半叶民族学的中国化	(270)
一 民族学中国化的问题	(270)
二 抗战时期民族学在中国的本土化	(299)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学在中国 本土化的曲折之路	(331)
四 20世纪上半叶民族学中国化的特点、 经验、问题和影响	(352)
参考文献	(365)
后记	(371)

导 论

第一节 引言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就是慷慨激昂而又十分悲壮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①。它是由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先生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这是一曲 20 世纪中

^① 赵新林、张国龙：《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 页。

国大学校歌的千古绝唱。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学者、莘莘学子在民族危难时刻最悲壮的呼喊，浓缩了联大文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所有情感和意志。在中国历史上，岳飞的一曲《满江红》已成为历代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慷慨悲歌。罗庸先生感人肺腑的《满江红》则是20世纪文人学者的一曲新的救亡悲歌。联大校歌充满悲愤、激昂之情，历数三校迁移、联合的经历，痛陈国家急难、民族仇恨，表明联大学人坚持抗战的坚强意志，阐明为国发愤学习的意义和必胜的信念。歌词言简意深，曲调雄壮，催人奋进。它以古曲形式来唤醒学子们的民族自豪感，倡导民族的传统爱国文化精神，充分体现出了西南联大文化精神的民族文化特性，对振奋联大师生的精神，激励莘莘学子为国发愤学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当日寇汹汹扑来之时，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和教育之精华免遭灭顶之灾，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一时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教大迁徙运动。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文教大迁徙运动中，有七十多所高等院校迁到西南大后方。201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对这一特定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定学者（当时迁居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特定社会（当时中国西南边陲社会）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本课题截取的时段具有典型的意義。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迁都西南地区，著名高校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西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但一批优秀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活动和相关的思考，却大大地加速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对于这两大学科来说，这一时期无疑是学科本土化重要的奠基阶段。正是国难当头的特殊环

境，使得许多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著名学者云集西南地区，他们主要集中在昆明、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推动他们去更深入地接触西南边陲的社会实际（西南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比较、思索、整理出丰富的材料，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和社会工作建议，并使民族学、社会学的“中国化”（即“本土化”）获得大步发展。在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发展史中，抗战时期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堪称民族学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黄金时期”。

抗战时期迁居西南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调查经费短缺、资料匮乏和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展开了对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民风民俗、社会结构、农业和农村经济、人口、地理等多方面的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人员不辞辛劳地在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民族地区走访和实地调查。他们风餐露宿，沐风栉雨，跋山涉水，实地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饥饿劳累自不待言，还经常要提防各种热带病的侵袭，有时还得和土匪交手。就是在这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坚持不懈，取得了十分突出的调查成果，为人们认识和研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风貌展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从而为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是调查的深化和发展，没有调查就无从研究，没有研究调查便毫无意义。调查和研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实地调查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在抗战时期大批迁居西南地区的著名学者中，吴文藻、费孝通、吴泽霖、陶云逵等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以中

国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先行者的身份，将其引进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具体运用到西南地区，既为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又开创了西南地区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

第二节 本课题学术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目前未见国内外学术界有人选择与本课题相类似的题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专著。只有有关中国民族学史、近代中国社会学、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西南联大、云南省志、贵州省志、四川省志、重庆市志和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的几本书里零散地、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点到为止，由于著述旨趣、切入角度不同，并没有展开阐述，更没有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1. 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著《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七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比较零散地提到了抗战时期对西南和华南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但遗憾的是只点到为止，写得很简单，只是调查成果的简单罗列，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至于调查的准备、详细经过、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等问题此书中根本没有涉及。这很可能主要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始材料很难搜集，再加上这些问题不是此书的重点所致。当然，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确实难找，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只发现了一部分这方面的材料，它们散见于众多资料中，查找出困难确实很大。另外，这些第一手材料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当时长期战乱，保存下来的很少。当年开展田野调查的民族学

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绝大部分已仙逝，健在的也属高龄老人，所以要想获得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从众多资料中去寻找。但是，笔者对此充满信心。

2. 杨雅彬写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册），郑杭生、王万俊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此两书比较零散地提及抗战时期社会学家对西部地区的社区调查和这一时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但也写得简明扼要，由于著述旨趣和切入角度不同，并没有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至于调查的准备、详细经过等问题此书根本没有涉及。笔者分析其原因同上，在此不再重复撰述。

3. 赵新林和张国龙合著的《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一书的第三章《弦歌不辍 硕果累累》中的第三个标题“成就斐然的学术研究”里提到了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对云南农业的调查（仅有300多字的简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云南的实地调查（仅有110多字的简介）和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语言、民俗、社会结构、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也只有750余字的简介），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至于实地调查的详细准备、调查经过、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一概没有涉及。

4.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一、二），也只是记载抗战时期在昆明的名流大师发生的逸闻趣事和生活如何艰辛居多，很少涉及这批名流大师对西南地区的实地调查，即便零散地涉及一点，也甚为简单。至于当时开展实地调查的详细计划、调查经过、调查方法和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上没有涉及。笔者分析除了如前所述的原因外，还由于此书回忆性的文章虽然很多出自这些名流大师的后代，但是他们仙逝的父母辈生前给他们讲述的可能大多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生活艰

辛和轶闻趣事，至于高深莫测的学术上的事情则告知得不是很详细所致。再加上长期战乱和举家搬迁，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大多遗失（除了公开发表的调查成果，如论文和专著外）。另外，由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南师大四校联合编写的六大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中，这方面的详细资料也不多。这六大本一千多万字的史料主要来自现存的北京大学档案、清华大学档案、南开大学档案和云南师大档案。

（1）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邢公畹先生的儿子邢宁撰写了一篇文章《旧历亲闻——南开边疆人文研究室邢公畹先生在昆明》，收录于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一书中。邢宁先生在此文中介绍了其父邢公畹先生在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概况，简单地记录了邢公畹先生在云南的罗平、新平、元江三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艰苦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工作，介绍了一些轶闻和危险。但是，遗憾的是，此文对邢公畹先生开展实地调查的详细计划、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没有涉及。

（2）梁吉生撰写的《英年一死献滇边——陶云逵在昆明的日子》，也收录于上书。梁吉生在此文中介绍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的经过和陶云逵的学术生涯及其生平简介，还简单地介绍了陶云逵带领研究室同仁对石佛铁路沿线的综合调查研究经过。

（3）朱端强撰写的《浪迹学风镌滇海——记陈达教授在昆明》，也收录于上书。此文主要介绍了陈达教授寓居昆明期间的艰苦生活，而对于陈达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对云南环湖户籍示范区的人口普查的介绍太简略。

（4）杨立德撰写的《“把故国河山，重新整起”——曾昭抡先生在西南联大》，也收录于上书。此文详细地记述了曾昭抡先

生在西南联大化学系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曾昭抡带领川康科学考察团步行考察大凉山的经过，而对于此次考察团的详细计划和准备、调查方法和内容、得出的重要结论这几个方面都没有提及。

(5) 段家政撰写的《吴文藻昆明行》，也收录于上书。此文简要地提到了吴文藻和他的得意门生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创办云大社会学系研究室（亦称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即“魁阁”研究室）的经过（仅240余字），至于此研究室的调查计划、调查方法等一概未涉及。

(6) 陈康定撰写的《学苑清辉——记语言学大师罗常培》，收录于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的《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一）。此文简介了罗常培调查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情况（仅430余字），罗列了调查成果的名称，而对于调查计划、方法和得出的重要结论都未涉及。

5. 由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云南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纂的《云南省志》卷75《社会科学志》，简单地概括和列举了抗战时期在昆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云南省的调查研究成果，即他们发表的论文和撰写的专著的简单罗列，没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笔者分析造成此种研究缺陷的主要原因，同第一点，在此不再赘述。

6. 邢公畹撰写的《抗战时期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兼忆关心边疆人文研究的几位师友》，收入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一书中。此文介绍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创立的经过及其刊物《边疆人文》，介绍了他本人和黎国彬在1943年的红河之行调查中发生的轶闻趣事和遇险的简要经过，而对于此次调查的详细计划、调查方法和得出的重要结论没有涉及。

第三节 进一步研究本课题的意义

一 对学科发展的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是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这种进展特别表现在当时迁居西南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西南地区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等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专家对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社会学在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抗战时期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进一步研究“抗战时期专家对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在抗战时期这一重要阶段的发展历程，可以填补专题深入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历史空白，从而为中国民族学史和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作出贡献。费孝通先生曾颇有感情地说过：“云南，是中国社会学的摇篮！”（见费孝通的《云南三村》）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试验基地。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中国民族学和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现实的社会意义

抗战时期迁居西南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辉煌的成就，真可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们给我们这些后世学人留下了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在进行西部大开发和在西部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手笔中，寻觅斯人久已失落之遗迹与学术遗事，以保护、充实和建设好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而且，由于这些遗迹与学术遗事是与抗战历史相联系的印证，对于缅怀当年西迁高校名流学者可钦可敬的爱国事迹和敬业精神，激励青年一代勤奋攻读、奋发图强的精神，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于这一批名流学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充分表现的严谨治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更是我们当今学人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的。在遭受市场经济大潮严重冲击下的当今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学术浮躁、急功近利、学风不正的现象。当今青年一代学人尤其是从事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更应该努力学习和大力弘扬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精神。笔者认为，要想出传世的学术精品，首先必须具备一丝不苟的“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治学精神。从这个层面来看，系统深入地研究抗战时期迁居西南的名流学者对西南地区的实地艰苦调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毫无疑问，西南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在对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首先对西部地区的民族旅游资源、自然资源等进行调查研究。例如，我们要开发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发展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我们首先要对西部地区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努力做到合理开发以保证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当今在西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会比抗战时期各方面条